

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概述

陳建忠

一、緒言：考察「後百年」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

去年正逢民國百年，舉辦了無數的慶祝與紀念活動，且似乎很多事物都趕著在百年這樣的數字到來前有番總結，以示作為一種對天時運轉的符應。然則，「後百年」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又當是何種景況？

某方面來說，這問題大概只能逼顯出本文作者之無能明察的窘境，因為跨越民國百年之際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走過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未久，與其說有更大的新變，不如說承襲著較多的遺產／包袱更適切。因此之故，本文或者無以為繼；或者，必須由這種後百年的遺產／包袱承襲現象裡，找出仍足資代表本年度的研究新進展，更針對延續性的問題做一番深刻總結，而不是只有任憑時間將「百年」這符號帶走，卻徒然將問題繼續留在現場。

關於2012年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之考察，本文預定先討論學界對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自身發展歷史的反思，可算是對「研究」的「再研究」。其次，以「比較、借鑑、納編」的方式持續開拓台灣研究疆域的學術思考，在本年度有新進展，值得關注，其間亦存在可供思考的學界慣性問題。第三，作為華語語系與國際漢學一環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近年亦有顯著活絡的傾向，其對台灣學界的影響如何？誠然必需留意。

第四，考察不同文類的研究，可以看出更細部的研究狀況，但對既有的文類研究發展概況而言，不同文類的研究傳統如何建立與詮釋，仍是有待關注的問題。第五，圍繞台灣文學史的寫作，仍是本年度的研究與書寫重點所在，革命既然尚未成功，自然有很多同志仍在努力。

一年之間訊息萬千，求全則難有新意，因此擬就以上所擬幾點勾勒出一個趨勢或癥結，雖然這麼做恐怕亦不免於筆者的主觀揀擇，缺漏之處，就有待各方指正。所幸，年鑑當中尚整編有許多本年度研究與出版目錄，有心人自可斟酌損益，以補本文之不足。

二、背著包袱向前衝：台文學界自身的檢討與前瞻

「台灣文學」，其成為研究上的「專有名詞」而被學術體制認可，並非不證自明；甚且，在台灣要研究所謂「國文學」（有這種說法嗎？），其指涉在近十年中雖已稍有共識，但亦非天經地義般的自然形成。無論如何，以台灣文學為對象進行的現當代文學研究既已歷有年所，並且諸多台灣文學系所亦成立約莫十年之際，有不少的回顧由學科的主導學者在本年度提出，可視為一種階段性的省思。首先，可注意來自台文系所的反思。

由成功大學台文系發行的《台灣文學研究》1卷2期，推出了「新興人文社會學科的建制化與發展」的專題，當中直指許多台灣文學發展、研究上的特點與問題。主編廖淑芳在「編者的話」中提出，必須思考新興學科在新世紀所面對的問題有：「台灣急遽的政經結構變化、少子化、高等教育環境惡化，及全球化勢力席捲等問題與挑戰。近十年這些新興系所不論在系所招生、課程內容架構、實際行政運作及學術競爭力等都有許多值得探討與關注的地方」。本文不擬全面檢討體制性或教育層面的議題，此與文學研究較不相涉，而著重在論者如何看待「研究」這件事。

清華大學台文所的陳萬益教授〈台灣文學的體制化、學科化與正常化：二十年來的課題與省思〉一文認為，在整體學術環境下，台文學界逐漸走向跨國、跨語、跨文化、跨領域的對話和比較研究。他認為，如果說1990年代偏重史料和作家作品的文學詮釋；那麼，2000年後則為文化研究導向的、以西方理論和方法為借鏡的開展局面。研究上也顯現出某些偏向如：「除了多少有文學性不足、理論太多；或偏重外緣研究，而缺乏美學探討」（頁14）。對於研究上的偏失，他還提醒了語言與文學研究的關係，認為語言課程不足或缺系統，是未來應加重視的。畢竟：「從語言、文學到文化的有機課程組合，以充實學生的台灣總體文化心靈，這是台文系的學科的本土特質」（頁14）。

文中對台灣文學是否能進入大學「通識課程」中的思考，尤其具有洞見。陳萬益認為在通識領域中開展出台文的格局，才是台

灣文學進入體制的可長可久之道。他提出了台灣文學研究可能的願景說：

我們可以持續接受大一國文或通識課程的文化經典，仍然偏勞中文系教授承擔嗎？我們是否應該鼓勵學生在進入社會之前，好好認識台灣的歷史文化，多少閱讀自己的文學經典呢？當然，可能的話，還應當接觸華文文學（包括中國當代文學、馬華文學等）？（頁16）

同一期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所的邱貴芬教授在〈新世紀台灣文學系所面臨的挑戰〉文中，開宗明義便「闢謠」說：「學院建制與政治的密切關連，國內外皆然，台文系所並非特例」（頁19）。例如中文系在國族認同建構運動上的作用，以及美國推動「區域研究」與其冷戰戰略的關連，都可看出此問題之「源遠流長」。重點並非政治，而是能否意識到政治的存在，特別是台灣擁有的殖民地政治經驗，維持學術的相對獨立性，讓學術能回歸到正常化的發展。

邱貴芬亦肯定「跨領域」和「跨國」的橫向延展，可豐富台灣文學內涵及其研究，而這兩個方向，幾乎是所有台文所共有的特色。但她擔心就華文文學角度來研究台灣文學，可能只以特定學術社群為對話對象，這是需要警醒的問題：

無論是張、黃兩位學者以馬華文學為主題而提出的「華文文學」或是台灣學者以後殖民角度詮釋的台灣文學，都以特定內部學術社群為對話對象，未能以一

個更宏觀的格局來展現這些理論的貢獻，這是何以兩者無論就影響力或是貢獻，都無法與Sinophone Literature這個概念相比的原因之一。（頁24）

文學研究教學的困境在於學科難以和其它學科進行對話和連結，日益孤立；因此，這是團隊合作的時代。學科愈孤立、愈無法與其它學科連結合作，就愈難找到立足之地。

這裡，就必須一提外文系所的反思，或不反思。究竟外文系所學者如何研究台灣文學？台灣的外文系如何更積極以各語系的世界文學為研究對象？或將外語文學與台灣文學進行比較性的研究？2012年6月的《中外文學》，單德興教授〈面對「不惑」，鑑往圖來：2012之交的《中外文學》〉就特別肯定：「《中外文學》與其他學術建制間的關係，尤其是比較文學在台灣與華文世界的推動與發展上扮演的關鍵性角色，會是另一個重要的議題」（頁193）這個看法，與劉紀蕙在2000年提出之「本土轉向說」合觀，則《中外文學》或外文學界究竟如何面對台灣文學？就帶出台灣的外文系在面對本土文學時應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

王智明在12月號發表的〈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外文學門」歷史化初探〉，則說：「外地文學論提供了一個跨殖民地（trans-coonial）的外文研究譜系，迫使我們在思索百年外文研究發展的同時，不得不面對殖民史的現代性與內在性，以及外國與本國文學的相互滲透、延異與共生」（頁198）。很難得的將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納入外文研究的視野裡，但畢竟仍屬少數的有識

之見。

稍加回顧，在外文系如邱貴芬、劉亮雅，社會學如林芳玫、蕭阿勤等教授帶著理論訓練，投入台灣文學研究後，所帶來的方法論上的革新，的確為台灣文學研究注入新意。但，就近幾年筆者經眼的如《中外文學》等外文系主辦刊物上之台灣文學研究，必須說，傑作固然很多，但理論割裂作品的例子恐怕亦在不少。甚且，連長年研究者如筆者，亦往往受阻於理論高牆或失焦的議題，而全然無法進入討論問題的脈絡，其間實存在著論述傳統、論述議題無法接軌的問題。

回想過往研究史，當夏濟安、夏志清、顏元叔等學者分析台灣文學時，這些問題並不存在，可見外文系的訓練未必都會造成對話的障礙。例如馮品佳教授本年度的〈離散的親密關係：蘇偉貞眷村小說中的感官書寫〉（《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5期）一文，就頗能引理論參照，但又扣著文本與台灣脈絡閱讀，其啟發性與對話性更為有效。總結來說，我們要如何具備方法論上的自覺？如何開展出台灣文學研究而有歷史感的研究方式？如何開創出可以共享而可資對話的議題（不是依照西方理論為解釋自身文學傳統所限定的視域）？這恐怕需要所有台文學界與外文學界一同省思。

三、比較、納編與借鑒：擴大台灣文學研究的新視野

承上所述，跨界、跨國的研究思考框架，已成為近十年出現新的研究傾向。但作法上，仍有待研究者逐漸予以實踐、落實。本年度在這方面值得關注的新發展，可以先

談台灣與中國大陸、香港等地文學關連性的研究近況。與過去不同的是，以往的兩岸三地研究變成一種強調「影響關係」的取向，多半是強勢文化影響弱勢者，或者以一種「文化中國」的角度來解釋或收編文學生產的文化意義。但新近的研究取向，更能由台灣主體的角度，合理、客觀看待各種歷史上出現的交流、納編與影響，承認那些事實的存在也對台灣文學產生「影響」、「刺激」，此研究態度無疑是擴大台灣文學研究的腹地。由此可知，台灣文學研究並非僅關心一時一地的文學生產，實則歷史上的文學關係若捨去，就絕無法正確理解台灣文學。

許俊雅教授的學術新路，便著重在渡台文人的前世與今生之整體關照，重新考察許多來台作家在30、40年代中國現代文壇的文學成就，此點尤屬不易；亦將來台後的許多活動與文化意義仔細梳理，可說是「厚描」（Thick Description）了一代知識人與文化人的心影錄。

本年度許俊雅的〈1946年之後的黎烈文：兼論其翻譯活動〉（《成大中文學報》38期），便討論黎烈文（1904-1972）這位被忽略的翻譯家，以「去留之間費思量」、「二二八後的翻譯實踐」、「黎烈文對譯事的態度」、「志文出版社竄改黎譯風波」等幾個面向來討論，標舉出台灣政治環境對其譯作題材的選擇，以及他如何透過翻譯安頓身心，同時討論其人思想究竟是左翼文人或左傾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尚有〈《洪水報》、《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台灣文壇〉（《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期），亦通過轉載過程之研究，要追索台灣左翼與中國

左翼的關係。其中特別指出《赤道》轉載頗多「創造社」、郭沫若、郁達夫的文章。

至於〈誰的文學？誰的產權？：日治台灣報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之現象研探〉（《台灣文學學報》21期）裡，許俊雅討論日治台灣報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之現象。當時選擇哪些文本？選刊的文本又以何種面貌呈現？文學作品的再次轉刊及改寫若可視為一個「文化跨越過程」，那麼從改寫後刊載的角度看，追索原本出處及所做之變造，可據以判斷文本來源及理解刊載用意，並進一步連結近代東亞各國報刊的流動現象，俾得客觀詮釋日治台灣文學。

可以說，許俊雅的研究擴大台灣文學研究某方面的研究空間，特別是台灣在戰前或戰後如何與中國大陸文壇發生聯繫，並在戰後如何接納一批流亡作家與文化人。對於「正常化」看待文學交流與文化流動，許俊雅「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應當可以啟發更多來者，將台灣文學研究的「腹地」延伸得更加廣闊。

須文蔚教授的台、港現代詩與現代主義文學比較研究，亦是這幾年的學術亮點。〈葉維廉與台港現代主義詩論之跨區域傳播〉（《東華漢學》15期）一文中提到，過去論及台港文學，一般認為香港文學深受台灣文學影響。事實上，50年代的台港作家，詩人來往至為密切。經過研究，論文認為香港文學在現代主義的介紹上，確實深刻地引導過台灣詩壇。本研究針對葉維廉青年時期，在兩地引介30、40年代現代主義詩學與作品，率先介紹與推廣新批評與超現實主義美學，協助《創世紀》詩刊在台港現代主義詩學發展上能夠獨樹一幟，進行文學史料的

爬梳與探討。

本年度，須教授尚有多篇會議論文如：〈當代台港現代主義詩畫互文之場域研究：以50-60年代台港跨區域文藝傳播為例〉、〈紀弦在台港文學跨區域傳播研究〉、〈《香港時報》副刊跨區域文學傳播研究〉等，皆是涉及台港文壇、藝壇的交流與傳播過程，資料收羅非常周詳，亦提供了一個帶有具體脈絡的分析，為台灣的跨領域研究開啟了較新穎的範疇。日後，若能在此基礎上，在台灣逐漸建立一個「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之類的研究單位，並舉辦更多的雙邊交流活動，當能發揮更大的延伸效應。

四、新階段的理論話語：如何面對新興的華語語系文學研究

台灣文學研究自然不只是一種「內銷自用」的研究模式而已，除了台灣本地的研究者外，尚有不少來自海外的研究者，並與台灣研究者相互對話，這也促成台灣文學研究進入國際學術的場域中。就本年度的狀況言，「華語語系論述」的興起，使台灣文學被帶往世界性的華文文學系統的討論範疇，並展現出有別於中國大陸以「世華文學」為名目的研究取向。新興的理論話語，更強調各地華語文學的在地脈絡與人文意義，具有開放、交流、尊重的色彩。對此現象，邱貴芬在〈新世紀台灣文學系所面臨的挑戰〉文中就認為：

在國際學術圈，「台灣研究」的學術圈原本就小，在「中國興起」的局勢中，專攻台灣研究的學者就業不易，通常必須把台灣研究放在更宏觀的脈絡下來

進行。我認為這是Sinophone Literature（或譯為「華文文學」）這個概念之所以興起和流行的原因之一。Sinophone Literature的理論已隱含比較的框架，以及研究對象的相對位置。無論是企圖標示與「中國文學」的不同，或是不同華語語系文學彼此之間的差異，被置放在這個概念底下來研究和教學的華文文學（台灣文學、馬華文學、亞美華文文學等等）都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單獨討論的研究課題，不可能不以「比較」的方式來討論。（頁21）

因此，本年接連出現了一些研究專輯、專書，都環繞著「華語語系」的概念開展，可以看到，試圖在世界範圍內重新思考台灣華語文學的定位和特色，也同時思考其他各國華語文學發展的特點，已成為某種新興的研究取向。

由蔡建鑫、高嘉謙兩位學者策劃、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便組稿推出了一個以華語語系研究為主題的專輯。在兩位合撰的〈多元面向的華語語系文學觀察：關於「華語語系文學與文化」專輯〉一文裡，就特別分辨說：

華語語系跨越穿梭政治、地理、血緣等範疇，本身就有其全球性意義；相較之下，儘管「世界華文文學」強調跨域和穿越國界，但更注重內轉迴向至文化原鄉。雖然「世界華文文學」帶有「世界」這樣一個超越國界的概念，「世界」更多時候是一個形容詞，為了修飾華文與對應中國而存在。直截了當地

說，恰恰是「世界」一詞的存在，讓我們察覺「世界華文文學」悄然延續了「文化中國／文化中華」的想像。（頁4-5）

專輯內收錄的主要論文如：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台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史書美〈理論、亞洲、華語語系〉、張錦忠〈華語語系文學：一個學科話語的播散與接受〉、陳榮強〈華語語系研究：海外華人與離散華人研究之反思〉、莊華興〈馬華文學的疆界化與去疆界化：一個史的描述〉等。當中對何謂「華語語系」？世界各地的華語語系文學與中國大陸的華語文學之間的關係如何？等問題，都有所闡釋。但，其實各種華語語系論述呈現出來的文學想像版圖，也存在許多歧異。總括來說，在北美學術場域發展出來的華語語系理論，本來就為了解釋「非單一中心」的華語文學書寫現象。台灣文學的文學語言雖不只有華語書寫，但作為「主要」以華語為書寫文字的場域，在文學出版與研究方面著實不可避免直面「走向世界」的潮流，因此勢必對此新興的理論話語要有所認識和回應。

換言之，台灣文學研究除了解釋自身，亦必需思考如何被「他者」所詮釋，更要將台灣文學與其它華語系文學之間的相對主體關係納入思考。如此一來，更「主動」的去解釋台灣文學與華語系文學的關係，便成為新階段研究者的重要課題。本年度如辛金順的《秘響交音——華語語系文學論集》，表明他所研究者已不限於台灣文學，而是包括台灣、馬華的華語系文學。至於台灣與馬華的華語文學之間該如何思考其間的糾結關

連，論者似未做進一步整合闡述，這也呈現了目前為止，華語系文學論述的特點與尚可開拓的方向。

除了華語語系論述，本年度也有翻譯海外研究的出版，可算是加強了對海外觀點的吸收，所譯論文與華語語系理論一樣，都生發於海外的研究脈絡裡。積極進行翻譯仲介工作的台灣大學出版中心，資助出版有：李爽學主編《異地繁花——海外台灣文論選譯》2冊、吳佩珍主編《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台灣文學·文化研究》3冊、邱子修主編《跨文化的想像主體性——台灣後殖民／女性研究論述》。

選譯的範疇含括歐美學界、日本學界關於台灣文學的研究成果。這些論文原本以外文形式在國外發表，有能力閱讀的人較為有限，如今通過翻譯的轉介，或許在下一波的研究中會看到針對這些海外觀點的更多回應。

五、文類研究傳統尚待建立： 關於文類研究上的癥狀

文類上的分類研究狀況究竟如何？又該如何描述？想來實非易事。主要是研究方法上長期都是共享的，在一年之中，特定文類研究上未必能看出重大差異。必須要累積夠多的樣本（如十年、二十年間的文類研究資料），才能看出較具體的文類研究發展趨勢，這項工作恐怕便不是一篇年度回顧文能擔當。事實上，台灣目前亦缺乏小說史、新詩史、散文史等分類文學史著述，由此可見文類研究傳統尚待開展之處甚多。故本文僅能稍加提出些基本觀察，以利於未來的年鑑作者去思考如何來描述文類研究上的發展。

因此，比較能介紹的恐怕便是針對本年中文學作品的文類研究狀況，觀察研究者如何針對作品提出回應。但這方面通常不會是長篇論文，而更多是書評之類的文學批評及短文，由此大約可看出文壇及研究界對新作的態度之一斑。

本年度的現代詩研究有多部專書出版，頗為可觀。如蕭蕭《後現代新詩美學》、孟樊《台灣中生代詩人論》、林于弘《群星熠熠——台灣當代詩人析論》、丁威仁《戰後台灣現代詩的演變與特質（1949-2010）》、楊宗翰《台灣新詩評論：歷史與轉型》、陳政彥《台灣現代詩的現象學批評：理論與實踐》。會議論文結集者有：陳芳明主編《練習曲的演奏與變奏：詩人楊牧》、黎活仁、楊慧思、楊宗翰編《閱讀白靈》。

這些多是研究者長年研究的結集，某方面來說，還是針對詩人的個論居多，再有則是針對詩學或詩潮的分析。對於現當代詩史的建構而言，從結構與方法上如何回應既有的文學史成說（以小說發展為主軸的文學史觀），該是很值得思考的面向，可惜現代詩史的寫作向來不是研究者重點，實有待更積極進行詩史理論與書寫的創構。

本年度的小說研究雖然不少，但專書出版無多，這大抵也可看出目前的學術生態，研究者都是依照升等需要而撰寫學報論文，實難完整性的將理念付諸專書出版。其中，王國安的《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以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的創作為觀察文本》，係以博士論文為本修正出版，對於解釋台灣後現代小說的歷史意義有較系統性的討論。至於封德屏總編輯的《百年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則延續「百年」的討論議題，

試圖對華語小說一百年做出跨兩岸的解釋，也能對小說史的建構有一定參考價值。

論述小說的單篇論文方面，歷史小說、歷史書寫的研究呈現比較多相關論文。代表性論文如：林芳玫〈「台灣三部曲」之《風前塵埃》——歷史書寫後設小說的共時與共在〉（《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5期）、張文薰〈歷史小說與在地化認同——「國姓爺」故事系譜中的西川滿〈赤崁記〉〉（《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期）、陳嘉琪〈台灣歷史傳說與讀物中的劉永福抗日形象〉（《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期）、陳建忠〈以小說造史——論高陽與張大春小說中的敘史情節與文化想像〉（《淡江中文學報》27期）、李欣倫〈受苦敘事與身體隱喻——以施叔青《台灣三部曲》與鍾文音《島嶼百年物語》為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22期），以及薛建蓉的博士論文〈日治時期歷史小說研究——以台灣報章雜誌漢文小說為考察對象〉。這些說明了，歷史小說或歷史書寫發達的台灣文壇，的確有必要對這類作品有更系統性的研究。這方面，依據的都是台灣歷史為背景的文本，或許有機會成為較有特點的文類研究傳統。

比較值得關注的是，散文研究的「方法論」自覺向來是較弱的一環，研究者以何種方法來研究散文，或是以何種散文史觀，決定散文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台灣散文史的闕如，無疑也促使我們該思考：台灣現當代散文與現代小說、現代詩的發展歷史，應如何整合為一種各有特色但仍相互呼應的文學思潮來描述？此種書寫框架的理論思考，尚待文學史研究者進一步論說。

本年度只有賞析性質的散文專書，如

吳宏一《從閱讀到寫作：現代名家散文十五講》、亮軒《亮軒開講散文篇》，並無散文研究專書出版。但研究所階段的論文，則生產不少散文研究成果，僅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教學碩士班」，就有呂汶玲〈顏崑陽的散文創作觀及其實踐〉、易元章〈張曉風的散文創作觀及其實踐〉、何佳玲〈張讓的散文創作觀及其實踐〉、林雪香〈隱地的散文創作觀及其實踐〉。但問題是，這些題目「幾乎」雷同的論文，也顯示了某種「程式化」的傾向，究竟散文可討論之處在哪裡？似乎，在當前研究傳統上，散文研究沒有更多學者持續性投入，除了長年研究的少數學者（例如何寄澎、陳萬益、陳昌明、張瑞芬等），後繼者有待更加努力，提出新階段具創新性的研究成果。

尚有值得一提的是「跨文類」的研究成果，黃儀冠的《從文字書寫到影像傳播——台灣「文學電影」之跨媒介改編》（台灣學生書局），書中主要處理鄉土小說與鄉土電影、瓊瑤小說與文藝電影、女性書寫與新電影、客家文學與電影敘事，歷史書寫與電影之間的關係，作為電影與文學跨界想像，本書的嘗試無疑說明了台灣電影如何取資文學創作，影像傳播又如何形構文化想像，論述頗有深度，也顯示了另一個跨文類論述的傳統發展的可能性。

除論文外，若考察文類研究上的另一書寫形態：「書評」，則筆者必須很悲觀地說，台灣實際上沒有太多能刊登書評的平面媒體空間，也沒有廣電媒體願意開闢談書的節目。文學的出版與傳播，真正成為極端小眾的事業，因為利潤微薄。目前僅見，《中國時報·開卷》每周一次見報的些微書訊與

短評，《聯合報》副刊有不定期的書評。至於《自由時報》副刊開放給創作者的欄位，可能是最多的，但亦多訪談介紹之類的內容，未見積極培養評論者參與其中。《文訊》雜誌有定期的書評專欄，未來比較能期許有特色的評家出現。

但另一個沒有書評，導致各文類的新作品批評效度不彰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評論者無法被容許成為獨立的評論者，而必須成為某種程度的推薦者；否則，就沒有下一次受邀寫評的機會。但評論者如果成為「助選員」，那又談什麼新書的批評呢？批評當然不是只有看壞，也可以是讚揚，但前提是那必須由具有公信力的研究者自由獨立地論證。我們期待看到持續性觀察而帶有指標性的書評家，也期待媒體展現企圖心與人文情懷。但事實是，停留在期待的階段，其實也不知早已荒廢多少年過去了。

六、接力式的寫作形態： 文學史書寫的新階段

去年的現當代文學研究焦點，乃是陳芳明教授的《台灣新文學史》出版，年鑑中已對此書之意義與觀點略有點出。可惜，歷經一整年的研讀、思考，迄今並沒有夠份量的回應出現，對於這樣一部皇皇巨作來說，不免是一種過於冷清的現象。學界沒有深入檢討陳著文學史，這意味什麼問題？

目前，只看到黃錦樹、隱地、宋澤萊、朱宥勳、紀大偉、藍士博等幾位的讀後感或書評，雖然提出一些細部的問題（如該收錄誰？台語文學何以未見收錄？鄉土文學論戰為何不寫？），但整體來說，並無人對文學史的根本寫作史觀、分期、框架、美學觀等

提出具嚴肅學理性的分析，這實不該是一個研究界正常的現象，的確有待於台灣文學的研究者自我反省（當然也包括筆者）。

不過，以文學史角度來研究、編著，仍然是台灣社會近年來方興未艾的一種學術活動型態，且遠遠未達理想之境。這正說明，台灣社會還是期待更多的文學史來解釋台灣文學的生發歷史，不僅是出於課堂上對教科書的需求頗殷而已，對於台灣人的文學與文化認知建構恐怕同樣重要。

在個人的文學史論專著方面則有如：應鳳凰《文學史敘事與文學生態——戒嚴時期台灣作家的文學史位置》、林央敏《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方耀乾《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封德屏總編輯《百年小說研討會論文集》等，顯示了針對不同時期與跨度文學史書寫的可能性。應鳳凰對反共文學如何重新定位、林央敏提出台語小說如何入史、方耀乾初步勾勒了台語文學史的譜系、以及百年小說論述中涉及的「民國史」如何跨越戰前戰後來敘述、納編，在在都是更新穎的台灣文學史所不能逃避的問題。

此外，延續幾年來的官方資助出版工程，國立台灣文學館在本年度推出一系列的「台灣文學史長編」及相關著作，仍然是本年度最值得關注的研究出版現象。國家資源的挹注或許能夠推動大型研究展開，但另一方面，究竟受命於年度預算而限時結案，對著作水平的影響如何？或能否更配合學者的研究進程以求準確翔實？思考這些問題，恐怕才是大型研究案能否真正成功的關鍵所在。但無論如何，類此接力式的集體寫作形態較有效率，能夠在限期內看到具體成果，極有可能成為未來文學史書寫的模式。

依照文學史的斷代順序，文學館本年度出版有：吳毓琪《離散與落地生根——明鄭時期台灣漢文學的發展面貌》、顧敏耀、薛建蓉、許惠玫《一線斯文——台灣日治時期古典文學》、陳淑容《「曙光」初現——台灣新文學的萌芽時期（1920-1930）》、李文卿《想像帝國——戰爭時期的台灣新文學》、余昭玟《從邊緣發聲——台灣五、六〇年代崛起的省籍作家群》、陳政彥《跨越時代的青春之歌——五、六〇年代台灣現代詩運動》、陳康芬《斷裂與生成——台灣五〇年代的反共／戰鬥文藝》、王鈺婷《女聲合唱——戰後台灣女性作家群的崛起》、戴華萱《鄉土的回歸——六、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走向》、蔡明諺《燃燒的年代——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論爭史略》、黃文成《黑暗之光——美麗島事件至解嚴前的台灣文學》、陳徵蔚《電子網路科技與文學創意——台灣數位文學史（1992-2012）》、陳大為《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台灣》、紀大偉《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其後並將陸續出版，以求其文學史長編之完整性。

此外，尚有封德屏主編《台灣文學期刊史導論（1910-1949）》、林佩蓉主編《從閨秀到摩登——台灣女性書寫》、施俊州《台語文學導論》，則也帶有以特定主題為期刊史、女性文學史、台語文學史做導論工作的編著出版。其餘如「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的出版工程也繼續運作中，本年度又推出十數位作家的彙編成果，計有：張我軍（許俊雅編選）、潘人木（林武憲、應鳳凰編選）、周夢蝶（曾進豐編選）、柏楊（林淇瀾編選）、陳千武（阮美慧編選）、

姚一葦（王友輝編選）、林亨泰（呂興昌編選）、聶華苓（應鳳凰編選）、朱西甯（陳建忠編選）、楊喚（須文蔚編選）、鄭清文（李進益編選）、李喬（彭瑞金編選）。以上都是極為周詳的研究資料，如此的出版魄力值得予以肯定。

上述研究成果，顯示在李瑞騰館長任內，文學館在學術上試圖有更積極的作為，也顯示了公部門（包括文化部本身）若能長期支持台灣文學研究，對於縮短撰史的時程會有極大裨益。不過，這批文學史型態的著作，彼此之間並沒有任何交叉討論的契機，所有的寫作都是平行進行。因此，眾書之間甚至可能出現對同一事件極大的認知差異，對文學史當如何書寫也未有任何共識。誠然，僅僅一年的期程，不可能要求作者更完滿的成果（這可能也是限期著述的問題所在），但如果要發揮更大的學術影響力，舉辦小型討論會或大型研討會來深入思考這些著作的問題，或許更能引發社會大眾與學界對這批重要研究成果的重視。

七、結語： 突破窠臼、積極前進！

依據前述本年度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可以總結出幾個重點：

在台文學界對台灣文學研究發展歷史的自我反思上，如何在「通識教育」上引入台灣文學教材，以及跨大與國際學界對話，是主要重點。

若是「比較、借鑑、納編」方式的研究取向，則持續開拓台灣研究疆域，正是尊重文學史實的表現；另一方面，外文學界與台文學界如何進一步建立有效的對話傳統，

應當也值得關切。

至於作為華語語系與國際漢學一環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台灣研究者實無法規避，唯有更主動積極的參與討論，才能面向世界，進而煥發台灣文學的特殊風采。

文類研究傳統以及嚴肅書評傳統的建立，歷來都未被正視。一個帶有傳承與自身論述特點的文學研究傳統，有助於研究成果的有效積累，教學應用上亦極便利，更能對外凸顯台灣的學術特色。

再有圍繞台灣文學史的寫作，對於既有的文學史論作應展開有建設性的對話。對於正在整編中的文類史、斷代史，則亦應通過研討會凝聚更多共識，如此方能促使學界加快吸收各種觀點，以利文學史的研究與撰寫。

回顧過往一年的研究成果，「後百年」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理當在總結成各種成就與問題後，勇於突破既有的窠臼，朝向許多尚待開展的領域積極前進。王安石〈登飛來峰〉有句云：「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問題是，總要先努力登上最高層，方能擺脫各種各樣的浮雲障蔽，擁有最開闊的視界。但願台灣文學的研究者都可以各自登高，再一同來彰顯台灣文學作家與作品的亮麗風采。